

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的 改造問題

陳學易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問題

陳學易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
的改造問題

陈 学 易 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福州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2 1/2 字数 48,000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2074·164

定 价：(六) 0.18 元

短 序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成为处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主要任务了。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出现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形势。清楚地認識这种形势，对于做好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无疑是有很太意义的。本书主要打算根据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理論和基本政策，結合历年来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实际情况，对当前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有利形势和工作中应该着重加以貫徹的几个基本原则，作一些分析和闡述。

本书由于写成的時間較早，現在看来，有些地方已經不很切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了。例如对于向党交心运动的闡述，分量显得过重，文章中所分析和批判的認識問題，有些已为事实的发展所証实，大体上已經解决；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分子中所出現的許多新的情况和認識問題，却没有得到反映。所有这些由于時間的限制，均未能加以修改和补充，这是須要加以說明的。

在研究民族资产阶级問題的过程中，曾得到中国人民大学領導方面和云光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得到張执一同志的具

体指导和热心帮助，以及其他有关机关和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的限制，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予以指正。

作 者

1959年1月于安徽黄池喻家楼。

目 录

一	党处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基本政策.....	1
二	全国解放后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的 历史概况.....	15
三	资产阶级分子自我改造的新形势.....	32
四	改造资产阶级的今后任务和工作中必须 贯彻的几个基本原则.....	44
五	结 尾.....	73

一 党处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基本政策

在我国过渡时期,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处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一个根本方面。对于正确处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同志已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中作了理论总结。这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例。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根据几年来的历史事实,我们来考察一下党正确处理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

在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般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因此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调整 and 解决这一矛盾,是我们党的根本政策。(但在某些较小的范围内,它是敌我矛盾,必须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为什么这一矛盾能够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呢?这是由于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由于工人阶级在力量对比方面的绝对优势。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革命的任务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使得他们之间的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一般地说,工人阶

級必須用專政的辦法，用強力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勝利地走過來的。但在我國，這個矛盾有其特殊性。這就是它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因此在這個矛盾的解決方面也有其特殊性。

在舊中國，由於三大敵人的反動統治和殘酷掠奪，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十分薄弱的，因而在政治上也表現得軟弱和動搖。在民主革命時期，它一方面要求革命，以便發展其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又害怕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壯大和發展。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也表現了它的兩面性。一方面由於解除了三大敵人的束縛，它強烈地要求發展資本主義，企圖把中國拖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實現這種要求，因之在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權並具有強大力量的條件下，資產階級只能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接受和平改造的政策。毛澤東同志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正是由於這種兩面性，使得它與工人階級的矛盾，既有對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對抗性的一面。這種矛盾的兩重性，就是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客觀根據。

民族資產階級（指資產階級中間派）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面性，表明了它實際上是一種中間力量。它動搖於高舉着社會主義紅旗的工农勞動群眾的革命勢力和堅決反對社會主

义的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等反动派的反动势力之間。既然是一种动摇的力量，那么就应当爭取它，领导它。以便通过和平改造的道路，达到消灭剥削阶级的目的。而以工人阶级为首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对于反动力量日益增长的压倒优势，跟着反动派只能逐渐走向坟墓的无情的历史和现实，加以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也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日益靠拢我們，倒向我們这一边，逐渐脱离反动派的影响。这也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問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另一方面的根据和条件。

由此可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同工人阶级的力量，同工人阶级与反动派之間的力量对比，同反动派的力量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几方面力量的变化和消长，也就会使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发生一定的变化，并显出不同的阶段性来。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生动过程，在很大过程上表明了这种内在关系和不同的阶段。下面分別几种不同的情况来作一些考察。

其一是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有所增长，其消极一面有所增长，因而引起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趋于紧张的情况。例如“五反”斗争之前，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就是其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长的緣故。“五反”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的政治威风被打垮了，于是才为和平改造創造了前提条件。资产阶级也开始了分化，出現了一批靠拢党、能够带头贯彻党和政府政策的进步分子。当然，無論在“五反”前或“五反”后，工人阶级的力量都比资产阶级力

量要强大得多，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但由于“五反”前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有所增长，因之它才敢于发动进攻。这就是说，即使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只要其力量有所增长时，也会使矛盾斗争紧张起来，并显出不同的阶段性来。

另一种情况，如全行业合营高潮和向党交心运动。在经过了1954年、1955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和平竞赛中，日益陷于破绽百出，日益被控制和削弱的条件下，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直接推动下，资产阶级分子接受改造的积极性迅速地高涨起来，纷纷奋起掌握自己的命运，形成了大合营的高潮。而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在1957年冬1958年春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大跃进形势的直接推动下，资产阶级分子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又出现了新的高涨，形成了向党交心、自我改造的群众运动。这二个接受改造的群众运动，紧跟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大跃进的高潮，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受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强有力的影响和制约。

再一种情况，可以右派进攻时资产阶级分子多数右转为例。当时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右转，充分说明了中间势力的动向，与敌我矛盾、敌我斗争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右派分子进攻时，我们的力量仍然要比右派的力量强大得不可比拟。右派之所以敢于进攻，一方面由于它低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势力（这是它的阶级局限性，它始终也不会足够地估计革命阵营的伟大力量的），一方面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因之它的势力有所抬头而已。然而就是这种情况，已使资产阶级分子多数右转

了。可見，我們如果沒有对反动派的压倒优势，不能把右派分子彻底斗垮；如何能使资产阶级分子回过头来向左轉呢？可見，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同工人阶级与反动派的力量对比，同反动派力量的消长情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要正确地把握和处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必須明确地把握上述几方面情况的錯綜复杂的变化。

但是，必須明确地認識到，由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着对抗性的一面，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它很容易轉化为敌我矛盾。这些条件是：(1)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变化，或者工农群众与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封建买办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反动派的变化；(2)我們的政策发生了錯誤，或者是右的錯誤，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麻痹了革命群众的政治警惕性，或者是“左”的錯誤，过分強調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使斗争失去了应有的分寸，不让资产阶级分子有一条出路可走；(3)资产阶级分子不接受改造，坚持其反动立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如此)。只要有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矛盾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从人民内部矛盾轉化为敌我矛盾。

因此毛泽东同志說：“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轉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們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們的这个政策，那末

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把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就是用民主的方式，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來解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已經證明：“在我們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變個體的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毛主席在1956年1月25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但人民內部也有不同的矛盾。有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有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矛盾，有勞動農民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有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等。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比之于勞動人民內部的矛盾，又有其特殊性。這就是由於資產階級的两面性，使得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中包含着深刻的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因此根據資產階級的两面性的特點，根據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的這種特殊性，我們對資產階級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這就是對其積極的一面，採取聯合和爭取的辦法，對其消極的一面，採取批評和鬥爭的方法。團結是目的，鬥爭是手段。鬥爭是從團結的目的和願望出發的，因此鬥爭是有節制的，在一定時期內是有限度的。這就是說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採取逐步推進，逐步深入的方法。一方面考慮到生產發展的實際需要，一方面也考慮到資產階級分子接受改造的可能程度，以便有

利于团结。同时我们的团结是有原则的，是以社会主义利益为出发点的，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有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必须进行严肃的和适当的批评和斗争，否则，团结就成为无原则的迁就，实际上也不可能真正达到团结的目的。可见团结既是目的，有时也是手段，是为了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团结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以适当的斗争来维持，斗争是有节制的，它必须以有助于团结为原则。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在处理资产阶级问题时的具体运用。

例如“五反”运动时，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其消极一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我们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斗争方式，但这种斗争仍然是有限度的，一方面并不没收他们的企业，而只是反对他们的“五毒”行为，另一方面，除了对不到5%的完全违法户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外，对其余的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因此在运动过程中，随着资产阶级逐渐屈服，斗争也逐渐采取比较温和的形式，如从“面对面”的斗争到“背靠背”的斗争，到“不战而胜”的斗争等。经过这种斗争，才使资产阶级开始接受和平改造政策，从而也就巩固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

大合营高潮时，我们又鼓励了资产阶级分子接受改造的积极性。但这种鼓励是有原则的，因为鼓励的不是资本主义积极性，而是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当时合营是以敲锣打鼓的形式出现的，但仍然是一种阶级斗争，不过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要比“五反”时温和得多了。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以及他

們的矛盾心理，對他們的企业並不立刻實行國有化，仍然是公私合營，仍給他們以定息，以便使他們能够逐步地接受改造。並且又立刻向他們提出了進一步改造成為名符其實的勞動者的嚴重任務。

反右派鬥爭時，我們明確地指出了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還基本上站在資本主義立場，還要進行根本的改造，不管他們當時是如何的不愛聽改造，但我們又不因為他們的立場問題還未解決，或者在右派進攻時所表現的右轉，而把他們與右派分子混為一談，而是把他們嚴格地與右派分子區別開來的。同時還吸引他們參加反右派鬥爭，以便更有效地斗垮和搞臭右派分子，同時使他們在對敵鬥爭中受到教育，而向左轉。

整風和交心運動中，我們贊揚和肯定了他們在自我改造方面所表現的決心和進步，同時要求他們在交心的基礎上，經過辯論和分析批判，進一步認識自己，並在實踐中去貫徹自己的改造規劃。

由此可見，隨着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力量的日益強大、資產階級分子的日益改造，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在二者間聯盟日益鞏固的情況下，不斷地調整和解決着。而其間的鬥爭，由於多方面力量的變化，資產階級的两面性表現的狀況不同，因之我們有時着重團結和鼓勵，有時着重批評和鬥爭，鬥爭的具體形式和方法，也隨之而變換，鬥爭的激烈程度也表現為時起時伏。雖然現在我們在經濟、政治、思想戰線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並沒有完全解決，其間的鬥爭也沒有結束，比較激烈的鬥爭，可能還會

反復出現，這是絲毫也不能麻痹的。不過總的說來，由於工人階級的力量日益強大，資產階級日益分化和孤立，其力量日益削弱，因之這種鬥爭的激烈程度也不能不有所減弱，鬥爭也有可能逐漸採取更為溫和的形式和方法。

不了解資產階級的两面性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它的積極一面和消極一面的強弱程度在不同時期會有交替，那末，就會犯“左”的或右的錯誤。如“五反”運動之前，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還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由於資產階級消極腐朽的一面還沒有充分地暴露出來，我們還沒有與他們進行象“五反”那樣的尖銳的鬥爭，因此許多同志對資產階級右傾麻痹，缺乏應有的警惕，結果不僅對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不能及時地覺察到，不少人還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擊倒了。“五反”後，隨着資產階級腐朽一面的充分暴露，以及我們與他們的尖銳鬥爭，又使一部分同志產生了“左”的情緒，認為資產階級只有消極的一面，沒有什麼積極性了，不恰當地夸大了其消極的一面，抹殺了其積極的一面。1955年社會主義革命高潮到來時，有些同志就對資產階級接受改造的積極性不敢承認，認為這是虛假的現象，因而不值得予以重視和加以鼓勵的，看不到社會主義革命高漲的大勢，對於資產階級起着何等重大的作用。在大合營高潮後，有些同志又認為資本主義所有制已基本上改變了，資產階級分子也已改造得差不多了，階級鬥爭行將結束了，右傾思想又有抬頭。結果，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面前，顯得麻木不仁，不能及時地、一針見血地識破右派分子的階級本質，洞察右派分子與我們之間矛盾的對抗性質。

这些事实表明：在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有所发展的情况下，容易犯右的错误；在其积极一面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容易犯“左”的错误。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充分激化和充分表面化的时候，容易犯右的错误，在这种斗争已经充分激化和充分表面化的时候，容易犯“左”的错误。

在贯彻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时，对于资产阶级分子，不仅要看到他的阶级本性，同时还必须在他的阶级本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其每个人的特点和进步情况，以便根据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在资产阶级分子中间也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情况（如经营的行业、企业的大小等）、每人的经历，以及接受改造的自觉性等方面有所不同的缘故。这就是说他们之间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这种差别，随着资产阶级分子的逐步接受改造，进一步表现为阶级的分化。阶级分化的日益加剧，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别也愈来愈大，并且也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这种差别，就是我们采取分别对待政策的客观依据，而贯彻分别对待的政策，又会加速资产阶级的分化，使他们加速接受改造。

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这种差别，一般地说，商业资本家比工业资本家的消极一面要严重些；中小资本家比大资本家要容易进步些；而青年资本家，由于“二短一长”（资金不多，剥削时间不长，来日方长），因之也比较容易进步。如“五反”前，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大户中“五毒”严重的要比在中小户中

的比重大；商业资本家进攻的手段和方法，其性质特别恶劣和毒辣。公私合营后，对于定息的态度，也是“大户感到很甜，中户还是留恋，小户无所谓”。从交心运动中的情况来看，据无锡市的统计，在重工业系统的36个私方人员中，贡献技术才能积极的占47.22%，在商业系统的46人中则为21.74%；对于下放基层、上山下乡，纺织系统的53人（大户）中，比较主动的占30.1%，而在服务系统的58人（小户）中，则占43.1%。

但这是一般情况，具体到每一个人，那么情况还是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因此这种一般情况，不能作为贯彻这一政策的最后根据。贯彻这一政策的具体根据，只能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这就是说不仅要估计到一般情况，同时还要估计到每个人的特点。因为每个人接受改造的情况，不仅与其客观方面的条件有关，而且还与其主观方面的努力有关。合营高潮后，这种主观能动作用的意义也越来越大了。

贯彻分别对待政策的例子：如“五反”时根据违法和悔过情况的不同，对工商户进行分类定案处理；而城镇均未进行“五反”；“五反”后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我们就肯定了他们的进步表现；合营高潮后，随着资产阶级分化的加剧，他们中间出现了左中右三派（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区分的标准），因此我们就进一步规定了提高扩大左派，团结教育中间派，孤立分化右派的政策等。

这里必须指出：如果说合营高潮后，资产阶级分子中的进步、中间、落后之分，还没有超出它是一种中间势力的范围，因此分别对待还没有超出人民内部问题的范围。那末合营高潮